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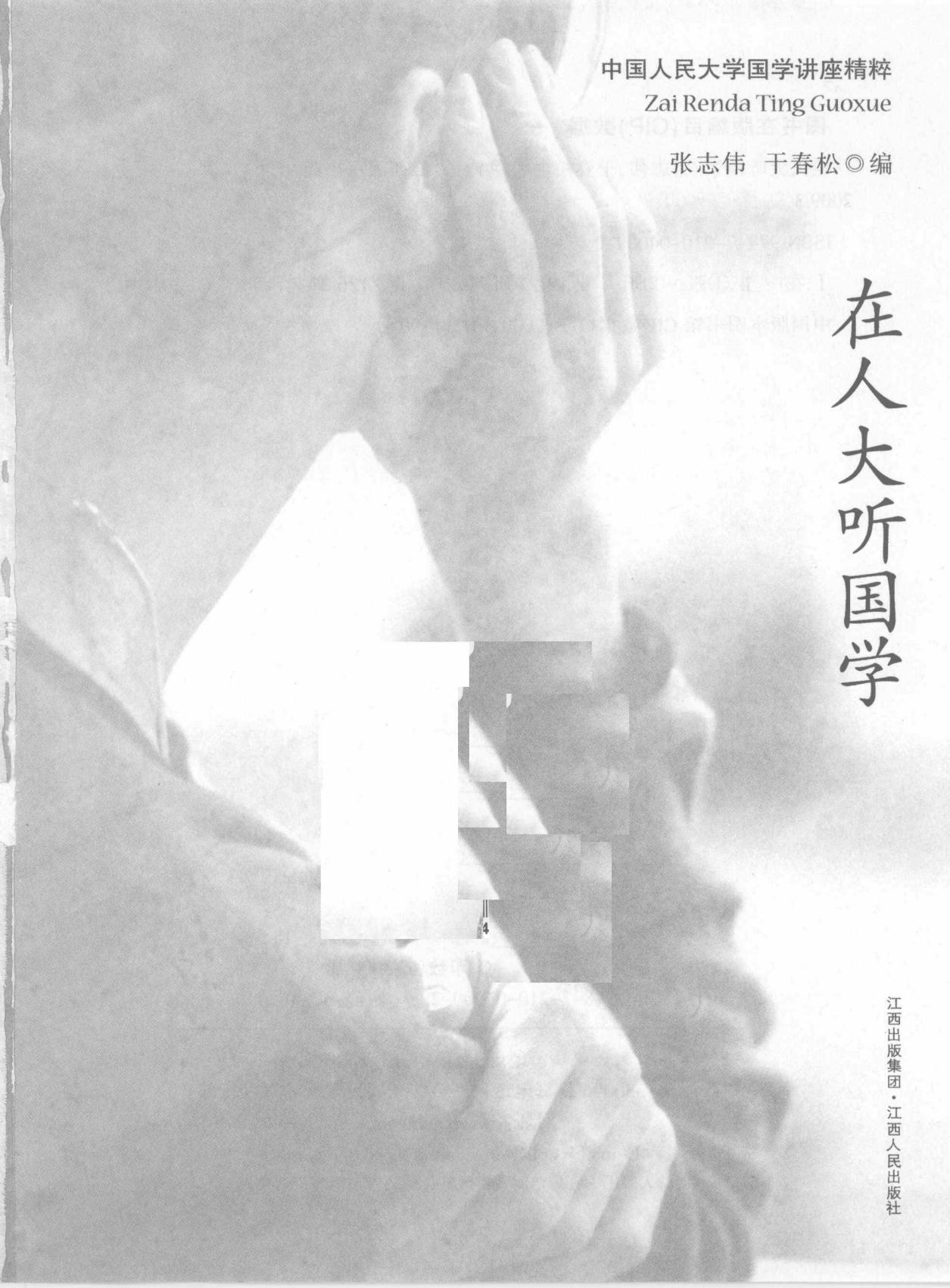
在人大听国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讲座精粹

Zai Renda Ting Guoxue

张志伟 千春松◎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讲座精粹

Zai Renda Ting Guoxue

张志伟 干春松◎编

在人大听国学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人大听国学/张志伟,干春松主编.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210-04000-2

I .在… II .①张…②干… III .国学-研究-中国 IV .Z12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1700 号

在人大听国学

张志伟 干春松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嘉欣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260 千 印数:1-3000 册

ISBN 978-7-210-04000-2 定价:32.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前言

在21世纪初所出现的“国学热”中，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是颇具标志性的事件。这不但是现在教育体制内对于“国学”这一学科的探索性尝试，而且也促使人们深入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

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等人倡导的将传统节日列入公共假日的提议终于落实，也许，这并不只是意味着我们休假方式的改变，而是要通过传统节日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符号找寻我们的文化认同和价值系统。

或许，有些人一听“国学”就以为是一种“复古”，在众声喧哗的各种观点中，我们能听到许多类似的描述，但这显然是对于“国学”的误解。国学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本身就是应对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挑战的产物，只有面对西学，才有所谓“国粹”、“国学”和“国故”等词汇的出现。所以，国学最紧要之处是站在中国本位、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来综合考察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与其说国学是“复古”，毋宁说国学是面向世界的一种眼光、一种比较“守成”式的眼光。

基于此，我们在这本讲演录中，不但可以看到硕学老儒对于传统学术的精辟阐述，也可以看到深通西学之士对于中西学术关系的独到认识，这些必将给我们以认识传统的新的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特长的大学，聚集着一批学有造诣的学者，在近年来的国学热和文化讨论中，领风气之先。他们的许多观点均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或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比如，纪宝成先生的文章，特别阐明了他对于国学的理解，引发了长达数个月的激烈讨论。程天权的文章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说明传统文化对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的意义。方立天教授是佛

学名家，他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佛教的一些基本原理和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张立文教授创立的“和合学”深受世人关注，他从中国古典中的“三句真言”入手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境界。葛荣晋教授一直关注中国思想与现代管理的意义，阐明了中国式管理的精蕴。孙中原先生以研究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著称，他从逻辑入手可以说是抓住了中国式智慧的关节点。宋志明教授讨论的主题是国学的哲理基础，从而可以使我们了解国学与哲学的关系。李秋零教授以独立翻译《康德全集》而为人瞩目，而他对“汉语神学”的讨论可以让我们了解基督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如何在信仰的纯洁性和本土化方面保持其平衡的。美学家张法讨论的则是中国现代建筑的政治意义。张志伟教授对于儒学如何在现代中国发挥作用的思考，一方面说明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强调传统文化唯有应对当代社会问题才有生命力。肖群中教授以对“孝”的研究名世，他提醒我们如何在现代的社会方式中贯彻孝的精神。向世陵通过对于儒学的核心精神的体察，论述了儒学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干春松的问题意识是儒学的多元化倾向，认为这样的多元化可以导致儒学找到与现代社会结合的最佳途径。

总之，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小小的思想之旅，如若“沿途”的景致能为读者所欣赏，那么作为编者的我们也就“乐莫大焉”了。

最后，我们要感谢为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各位学者，特别是纪宝成、程天权教授惠允其作品列入本书。郑水尔、朱陈、魏如祥也付出了很多辛劳。

张志伟 干春松

2008年12月

** 目 录 **

- 纪宝成 重估国学的价值 /1
- 程天权 提高国家软实力：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11
- 方立天 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 /21
- 张立文 国学略说——易、儒、道、释三句真言 /39
- 葛荣晋 中国哲学智慧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61
- 孙中原 逻辑元研究与中国人思维方式 /89
- 宋志明 国学的哲理精神 /119
- 何光沪 中国传统中的人文精神与宗教精神 /139
- 张 法 北京城的符号性建筑在改革时期的演化 /173
- 张志伟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于儒学现代化之可能性的反思 /193
- 李秋零 “汉语神学”：一个崭新的神学运动 /217
- 肖群忠 “孝道”养老的文化效力分析与展望 /235
- 向世陵 儒家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影响 /249
- 千春松 多元化的儒学面向 /269

重估国学的价值

纪宝成

纪宝成

国学这一概念，从清人林则徐开始，直到民国初年孙中山、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对国学的定义是相当宽泛的。国学指的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即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教育、艺术等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吴虞等学者，对国学的定义是相当宽泛的，他们认为国学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为特征的文化”。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指出：“国学”一词，“其范围极广，凡属于我们民族之过去一切事物，在其发生时，有无形的，或有形的，都是国学”。陈独秀的“国学”概念，实际上就是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阅读提示：本文是作者一系列弘扬传统文化精神的讲演之中最重要的一篇。作者首先提出了自己对于国学的理解，即认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本文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但认为在新的时代，需要我们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意义进行重新估计。

纪宝成

男，汉族，1944年11月出生，江苏扬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6年于北京商学院本科毕业，1981年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以来，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商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直属高校办公室主任。2000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商科教育分会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曾荣获“国内贸易部部级专家”称号，并被国内和美国、日本、韩国等多所高等院校聘为名誉教授或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纪宝成教授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的价值，所以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并积极推动传统节日成为国家公共假日。

也批评国学“空洞”“虚浮”“不着边际”，讲文本学者指出国学中纯理论性学术模式的弊端，批评国学僵化、陈腐，大力推崇《周易》《诗经》《左传》《国语》《史记》。由来已久的国学研究者对国学在当代学术中的神圣地位表示怀疑，“批评国学的空洞、虚浮、不着边际，批评国学僵化、陈腐，批评国学的理论模式的弊端……”。然而，国学研究者对国学的评价却大相径庭，他们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民族文化的命脉，是民族精神的根基，是民族智慧的源泉，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是民族的骄傲，是民族的脊梁。

当我们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但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当我们的大学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甚至连中文写作都做不到文从字顺，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文化教育一定是在哪个重要环节上出了问题，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是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服的障碍与挑战。

导致这类现象出现的原因自然很多，如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实用功利主义的驱使与影响，如西方强势文化话语霸权的渗透与制约，等等。然而，其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承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或迷失，对体现民族之魂魄的基本载体——国学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忽略或偏激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漠视文化本根做法的后遗症将显得日益严重，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而是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因此，在今天完全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重建国学的学科。

一、披沙拣金：衡估国学的价值

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唤国学、重建国学，首要的前提，是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认识国学、理解国学，对国学的内涵、性质作出准确的把握，对国学的价值、意义作出科学的总结。

所谓“国学”，作为名词古已有之，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然而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概念，则是在 20 世纪初形成的，其具体的界定，人们多有分歧，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它指旧学，相对于西学它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今人

眼中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我们认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国学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与时代精神，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一样。我们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冷静地考察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就能够发现，第一，就形式而言，国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中华文明中的观念文明部分，通过国学这种文化形态得以展现并传承，它就像一根坚韧纽带，将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中华文明珍珠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第二，就内涵而言，国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像流水一样，滋润着中华民族的茁壮成长；像土壤一样，培育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它使中华民族以特有品质与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风骚。儒家所倡导的“德治仁政”治国理念，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哲学思维，法家所主张的“信赏必罚”管理方略，墨家所宣扬的“兼爱交利”文化精神，兵家所阐发的“避实击虚”行为科学，均已积淀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和宝贵的历史财富，为中国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第三，就文化的承继性而言，国学是走向新时代的起点，建设新型文明的资源。庄子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真正优秀的思想文化，是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它的某些内容，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然而它的合理精神，却超越时空的界限而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条件与文化主题与古代社会已有本质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从事新型文化创造也不可能只是对传统学术的简单回归，但是历史不能割断，文化无法终结，新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传统为资源，否则便是数典忘祖，而所谓“建设新文明”云云，也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高度重视国学，揭示其

价值并按照现代理念进行改造与重建,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

二、百年悲欢:反思国学的失落

国学的价值与意义毋庸置疑,国学对现代文明建设的作用无可替代,然而,近百年来,国学的际遇却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学的地位由社会意识形态的巅峰迅速向下滑落,长期沉沦在遭否定、受针砭的尴尬境地。尽管曾有人创办过各类国学专修学校,出版过多种国学刊物,大声疾呼重视国学、重建国学,可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曲高和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学被边缘化的颓势。当年梁启超谋划开办《国学报》的不了了之,马一浮惨淡经营复性书院的难以为继,就是这方面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百年来,国学地位遭贬低,国学价值遭否定,国学意义遭质疑,国学前途遭抹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历史进程,始于鸦片战争的失败,而随着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结局而强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趋向高潮。当时由于袁世凯、张勋等人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使正处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组织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而社会上尊孔崇儒、设立孔教的喧嚣与政治复辟等行径,直接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对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猛烈批判。这一方面是全面否定孔子与儒家经典。如陈独秀曾称,“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持不长久”(《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320页)。吴稚晖对中国社会所长期尊奉的孔子等先秦诸贤,极尽奚落、挖苦、咒骂之能事,将其称为“周秦间几个死鬼”,断言“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吴稚晖学术论著》,第124页)。四川的吴虞则明确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另一方面是主张彻底废除国学,内容涉及古籍、习俗、节日,甚至文字、姓氏,如钱玄同主张不拜孔子、关羽与岳飞,认为“端午、中秋……简直是疯子胡闹,当然应该废除,当然应该禁止”(《钱玄同文集》第二卷,第17页)。即便是像鲁迅这样杰出的思想家,有时也不免对与国学相关联的事物采取片面偏激的态度,如对中医中药的功用一概加以否定,对京剧等传统文娱形式也刻薄嘲讽、无限“上纲”。总之,在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

代名词，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

这种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痛感中国近代落后挨打悲惨历史的产物，是他们极度忧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积愤之言。他们的感慨、愤懑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国学中的确包含有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束缚人心与人性的三纲五常伦理等等，必须经过改造和扬弃后，才能重新焕发精神，与现代生活接轨。然而，真理越过一步即成为谬误，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加以一概抹杀，全盘否定，显然偏激而片面，就像恩格斯批评杜林对待黑格尔、康德的非理性行为一样，是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并不可取。

其实五四运动前后，新型知识分子也并不都是一概批孔贬儒、否定国学的。如郭沫若就曾将孔子与华盛顿、列宁、罗素等人相提并论，又如蔡元培、贺麟等人也曾主张抽象地继承孔子的精神遗产。即使是一度激烈反孔、否定国学的人，如陈独秀等，日后的观点也有所变化，主张以科学理性的立场与方法评价孔子，分析国学。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是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识和借鉴以孔孟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如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刘少奇在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也把“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与“学习马列主义”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五四”前后激烈而亢进的反传统文化大潮的后遗症依然是十分严重的，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颠覆性的破坏效果，造成的文化精神裂痕与创伤深刻久远，长时间无法得到弥合。在未能为文化激进主义无情攻击与荡涤的国学进行堂堂正正的正名前提下，要正确认识国学的地位与价值自然困难重重，要振兴国学，重塑民族之魂也一样举步维艰。而近代以来，按新式学科体系打破国学原有整体结构，文、史、哲彼此独立成为专门学

科,虽说有它的合理性,并在各自领域一定程度上承续了国学的相应内涵与传统,但毕竟在国学的整合性上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这多少也是使国学传承与光大不能顺畅的一个外部原因。

三、回应挑战:走向国学的重建

一方面国学作为中华文明之根,直接关系着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民族意识自觉性,其价值与地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国学发展的道路崎岖坎坷,留下了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其后遗症至今仍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产生着消极的影响,于是,我们就合乎逻辑要提出一个重大的文化命题: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脊续文脉,重建国学,振兴国学,使之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应该乐观地看到,在今天重建国学、振兴国学正遇上很好的机遇,具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

这首先是重视传统文化正越来越成为人们广泛的共识,为重建国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多年来重理轻文的价值取向,忽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借鉴,其潜移默化的结果,是文化迷茫的触目惊心,道德滑坡的愈演愈烈。这一点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希望通过历史地、辩证地弘扬以儒学合理精华为主体的国学,来扭转社会风气的趋向,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全面提升人的基本素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业已成为普遍的要求。

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讲求国学的背景不同,在当前重建国学是中华民族强大自信的标志,是进入世界多元文明体系,开展文化对话的表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掀起过国学热,一部分知识分子曾创办《国学季刊》《国粹学报》等刊物,为振兴国学而全力以赴、摇旗呐喊,然而这是面临外患迭至、救亡承续的被动反应,属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悲壮捍卫。今天的情况则不同,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与影响力日益扩大,各国对创造经济奇迹的中国文化土壤投入了更大的关注,兴趣越来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重建国学,乃是属于均势地位条件下的对话,而要进行世界范围的文明对话,重要的前

提之一,是必须凸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道理很简单,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重建国学恰好能满足这种时代的需要,能更好地张扬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与时代意识。

国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学科,近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受新式教育学科体系分类而被消解,分别归属于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但是分散在这些学科中的国学基本内涵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保留以及相应的发展,换言之,国学在今天社会的文化建设中依然是有一定基础的。重建国学只要认识到位、时机得当、方法恰宜,具有相当大的可操作性,即主要是进行综合的技术性操作问题;对于缺乏基本素材的能力建设问题或知识结构的短缺问题,也是可以通过累积效应逐步加以解决的。

显而易见,重建国学、振兴国学有前景,有支撑,有需求,有共识,有条件,适逢其时也!

当然,国学的重建与振兴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反复尝试、长期坚持、不断改进与完善的过程。我们认为,总的原则应该是在创新的基础上重建,做到积极借鉴汲取前人经验与根据新的形势不断开拓创新的有机统一。具体地说,其重点是在四个方面: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队伍,重建学科。

重建理念。在今天重建国学,决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要以现代的理念指导国学的重建:一是要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畛域,不为整理国故而整理,而是立足于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接受借鉴。二是要具有世界意识,开阔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个性的新型国学。三是要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除传统的文史哲内容外,要注重扩充新的成分,包括要改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念,增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整理与研究。

重建方法。重建国学,研究方法与手段上的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传统的方法与手段当然要借鉴,要运用,但是不能仅仅局囿于此,而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包括系统论理论、信息技术、计算机数据处理分析技术、数学模型处理等等。要协调好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比率关系,同时广泛借鉴新

的学科知识结构,如在史学领域,除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外,还可以大量引进口述史学、心态史学、影视史学、计量史学的知识,使国学研究与传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随着对外交流的拓展,还必须加强语言上的沟通能力,从而更好地吸收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

重建队伍。人才队伍的建设是国学重建中的重中之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国学研究队伍,重建国学便只能停留在口号阶段,必然会流于形式。因此建设具备现代理念、掌握现代科技、拥有扎实传统文化学术功底、富于献身精神的国学研究队伍乃是振兴国学研究的根本前提。在队伍重建中,高等学校将起主导性的作用,承担着搭建国学人才培养广阔平台的重大责任,因此,在一些有条件的高校设置国学专业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重建学科与人才培养联系密切,国学专业学科的重建也要以创新的意识予以高度的重视和积极的筹措。这包括国学专门人才的选拔方式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设置、教材体系的建设、学制学位体制的确定、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论证等等。做到学科的重建有利于国学研究特殊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所培养的人才真正能够成为国学整理与研究的骨干力量。

重建国学、振兴国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当在实践中积极摸索,随时调整,逐步完善,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允许多样化,允许讨论和争议,由历史来检验,由社会来评判。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坚信,只要秉持正确的理念,投入积极的努力,运用恰当的方法,那么,国学振衰起弊、继往开来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提高国家软实力：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程天权

阅读提示：本文从“软实力”这个新的观念入手，提出了建设中国当代的核心价值观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关键，并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为提高软实力作出应有的贡献。